

法制史研究三十六期
二〇一九年 十二月

劉錚雲《檔案中的歷史： 清代政治與社會》評介

馬超然*

《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一書是劉錚雲先生三十餘年來整理、研究清代檔案與歷史的成果結晶。本書涉及清代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基層組織、會黨叛亂等多種議題，並從個案研究出發來考察清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競爭，以及地方民眾的生活實態。作者將傳統正史、志書、方志、文集等史料與檔案材料相結合，大大豐富了清代歷史的研究圖景。這些個案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幾個觀察清代政治與社會的剖面，讓我們看到中央政府、地方官府與基層社會之間存在著持久的張力，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在制度議定與實行過程中，三者之間的關係被打通，上層政治與基層生活在制度運作下有了更多互動的可能；到了清代中後期，地方社會動蕩不安，政治制度與道德秩序漸漸失效，中央和地方層面的政治競爭日益加劇，出現了新一輪權力博弈與格局重組。

關鍵詞：劉錚雲、清代檔案、制度運作、基層社會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感謝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壹、前言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劉錚雲先生為撰寫學位論文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查閱檔案，從此與清代檔案結下不解之緣。此後入職中研院史語所，劉錚雲先生直接參與了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並負責該史料的數位化工作。自2001年起，劉錚雲先生又曾借調台北故宮圖書文獻處三年，管理檔案與善本古籍。如今，「明清與民國檔案跨資料庫檢索平台」的建立，使得台北故宮博物院、中研院近史所、史語所藏檔案史料實現跨庫檢索，劉錚雲教授亦為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和貢獻。

《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¹一書收錄了劉錚雲先生三十餘年來從事檔案開發及清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全書共收入十九篇論文，主要是以清代檔案為研究材料，探討了有關政治、社會，以及檔案整理等多個領域的問題。本書主體部分總共分為三編，即「檔案中的清代政治」、「檔案中的清代社會」及「檔案與歷史研究」，各編中的論文以發表時間先後排列。

本書所涉及的研究議題十分多樣，包含了清代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基層組織、會黨叛亂等多個面向的問題，展現了作者多年來在各個議題與領域中所取得的突破和創見。然而，在看似各自獨立的專題研究之間，我們依然能夠找到其中的內在邏輯。筆者認為它們都是圍繞「制度的運作」與「人的流動」這兩項重要議題而展開，探討了清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博弈以及州縣治下的社會生活等問題。因此，本文計劃將諸篇論文按主題與內容分為三個層面進行概括，之後將結合與之相關的文獻與研究進行綜合性述評。

1 劉錚雲，《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貳、本書內容簡介

一、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競逐與政治運作

本書第一編收入了劉錚雲有關清代政治的五篇研究文章。〈「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州、縣等級初探〉一文關注到自雍正九年，清廷開始以「衝、繁、疲、難」四個標準來評定州縣等級的高低，並依此來確定地方官員缺的等級及甄選方式。廣西布政使金鉞最初提議重新制定官員任免制度，是爲了將督撫調補的做法制度化。將近四年之後，吏部才提出覆奏，接受了以「衝、繁、疲、難」四項定州縣員缺緊要的建議，但是只有四項俱全或三項兼全之缺，才由督撫調補，其餘仍由吏部銓選，暴露出地方督撫與吏部在州官人事權問題上的博弈。

自新制推行後，全國範圍內各州縣缺分經歷了由繁改簡、由簡改繁的多次變動。作者在〈皇權爲中心的權力競逐：以清雍正十二年官缺更定爲例〉一文中指出，由於雍正皇帝堅持吏部的月份銓選不受地方督撫侵蝕，督撫轉而採取新策略，以違例提請的方式與吏部競逐地方人事主導權，在個別員缺問題上向皇帝爭取特旨允行。雍正以降，督撫爲地方人事問題頻繁上奏，甚至出現督撫濫請提調州縣的情況，由此可見中央與地方在州縣人事問題上的競逐從未停止。

在探討了中央與地方的制度博弈之外，作者還考察了州縣治下的基層社會與政治運作。〈鄉地保甲與州縣科派——清代的基層社會治理〉一文中作者觀察到，在地方實踐中，里甲與保甲制度演變出了多種名目，而且名目之間經常交織重合，呈現出錯綜複雜的情況。劉錚雲認爲，這是因爲地方官府只關心差徭科派是否能夠得到滿足，至於科派的名目是什麼則並不經意。此外，劉錚雲還指出，在基層社會中，由於有里甲、保甲、鄉約等衆多名目的人員承擔政府差徭，並於

每月朔望日到衙門點卯，因此州縣官實際上有能力通過控制鄉地保甲進而掌握鄉村社會的動態，從而挑戰此前學者所謂「皇權不下縣」的說法。

〈官給私帖與牙行應差——關於清代牙行的幾點觀察〉一文關注了清代州縣衙門私自給發牙帖的現象。根據清廷規定，只有布政使司發布的官帖才具有合法性，作者指出，之所以州縣官府持續大量發給私帖，並且對牙行需索無度，究其根源在於州縣財政的窘迫。自雍正朝實行「耗羨歸公」後，原本是陋規的「耗羨」被合法化，但與此同時州縣官的財政自主權也被剝奪。在這一情況下，州縣官不得不想盡辦法開源節流，而大量私發牙帖，不但能夠增加牙稅收入，還能增加更多可供需求的對象，大大節省衙門的日常開銷。

在〈金錢會與白布會——清代地方政治運作的一個剖面〉中，作者考察了咸豐、同治之間浙江溫州府的「金錢會」事件。金錢會是一個有秘密宗教色彩的會黨組織，但是在士大夫領導的地方團練興起的過程中，這一會黨組織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作者從地方政治生態入手，揭示出溫州上層士紳與下層士紳在籌辦團練問題上的競爭局勢，金錢會勢力壯大和叛亂蔓延就是地方上兩股勢力相互抗衡的結果，而金錢會事件的爆發則根植於地方上官、紳、兵、民的不和。

二、地方社會的人員流動與社會組織

在本書的第二編中，劉錚雲關注到地方社會中人群的流動及其生活實態。〈城鄉的過客——檔案中所見的清代商販〉一文討論了清代商販的出身背景與經商動機，以及他們的經營方式與資金來源。作者強調，無論是行商還是坐商，游動性強是他們的一大特色，而且游動範圍不只限於城鎮或市集，也包括村落。在〈檔案所見清代社會夫妻關係的斷裂與終止〉一文中，作者考察了數個涉及夫妻失和的案件，提出清代夫妻關係的實際情況不能簡單以「男尊女卑」來概括。

隨著時局的動蕩和人員的流動，「士、農、工、商」的四民等級與「男尊女卑」的道德規範日益受到挑戰，出現了許多遊走於四民等級和家庭關係之外的邊緣群體，他們往往爲了相互支持、謀求生存而選擇秘密結社和異姓盟會。在〈清代會黨時空分佈初探〉中，作者指出，會黨活動由雍正年間開始，嘉慶、咸豐、光緒、宣統四朝達到高峰，期間道光以及同治年間會黨活動的頻率曾趨於平緩。隨著時間的變動，會黨問題的焦點由清中葉嶺南、東南沿海地區轉移到清末葉長江中下游地帶，同時，還有從邊緣區或是偏遠地區轉向核心區的發展趨勢。

〈囑嚕：四川的異姓結拜組織〉一文關注到了清代中後期活躍於川東與陝楚交界地區的會黨組織——囑嚕，這是一個由來自社會底層的無業、無田的外來人口與地方無賴組成的團體，傾向於在政治發展較落後與政治控制較弱的地方犯案。此類會黨取代了家族與社群組織所提供的社會網絡，保障了這群邊緣人在變動的環境下得以生存。在〈湘軍與哥老會——試析哥老會的起源問題〉一文中，作者指出，哥老會最初是在戰場上自然形成的一個互助團體，其後借鑒了川湘一帶的囑嚕或江湖會的組織形式，演變爲了會黨團體。接著，〈哥老會的人際網絡〉一文考察了會黨的組織形式，作者指出，哥老會山堂大多位於沿江的重要城鎮，山堂的成立是基於個人結拜的關係，而山堂間的聯合則是人際關係的擴大。

在異姓盟會之外，劉錚雲還關注到宗教團體的情況。〈清代的宗教結社：以直隸省老理會爲例的個案研究〉一文認爲老理會基本上是一個組織鬆散的團體，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組織制度，並不像白蓮教組織一樣有很強的向心力和完善的組織形式。但是由於傳徒可以斂財，許多人不斷嘗試建立新的組織以吸收途眾，構成了清代宗教團體團體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三、檔案材料的整理與運用

本書第三編涉及清代檔案的整理工作與開發情況。〈舊檔案、新材料〉一文中，劉錚雲概括了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的總體情況，包括它的整理過程、整理成果及涵蓋內容。〈內閣大庫檔案中的疾病與醫療史料〉介紹了與醫療史相關的檔案材料，其中記載了傳統社會有關內、外科疾病及其治療方法，以及麻風、天花等疾病對病患與清代社會造成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台灣史料彙編〉一文則介紹了內閣檔案中與台灣有關的豐富材料。

接著，作者進一步探討了開發與運用檔案材料的方式。〈口供中的故事〉一文分析了關於清代訴訟案件的題本與抄本，並利用其中所收錄的口供材料考察了清代諸多社會現象與清人的生活習慣等問題。在分析《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的分析中，劉錚雲從製作態度、戶口大小、性別比、人口增長率等方面進行檢視，認為這本民數冊的記載基本能夠表現當時四川人口的實際情況。在〈尋找大清「精微批文」〉中，作者介紹並辨析了「精微批文」這一類特殊的檔案文件，並介紹了其用途形制、請領程序。在〈也是歷史——清雍乾年間四個女人的故事〉一文中，作者則嘗試利用檔案材料，來考察清代基層社會的真實生活，尤其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處境與遭遇。

參、本書的特點與評介

《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一書最大的特點在於，除了傳統的正史、志書、方志、文集等史料之外，作者還大量搜集檔案材料作為論述基礎，而且其所採用的檔案文獻類型十分多樣，從《內閣大庫檔案》，到以《巴縣檔案》為代表的縣級衙門檔案，到特定事件的相關檔案，如《金錢會檔案》等等都一一涉獵。尤其是將檔案材料

與傳統史料相結合的做法，大大豐富了歷史的圖景，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歷史演進的脈絡與實態，上至清廷中央的政治運作，下至基層社會的日常生活，都在檔案研究中有了更深刻的揭示。

其次，該書所錄文章多從個案研究出發，來考察清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競爭，以及地方民眾的生活實態。雖然其所探討的問題看似各自獨立，分別涵蓋了士紳、會黨、商販等多種社會人群，涉及了商業、宗教、社會組織等多個議題，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個案研究不止闡明了一時一地的問題，而且也無時無刻不在與大歷史進行著對話。

這些個案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幾個觀察清代政治與社會的剖面，讓我們得以看到中央政府、地方官府與基層社會之間存在著持久的張力，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在制度的議定與實行過程中，三者之間的關係被打通，上層政治與基層生活在制度的運作下有了更多互動的可能。到了清代中後期，地方社會動蕩不安，政治制度與道德秩序漸漸失效，中央和地方層面的政治競爭日益加劇，出現了新一輪的權力博弈與格局重組。

劉錚雲提醒我們，清代政治的基調首先在於皇權的空前高漲以及其對基層社會的深度滲透。多年來，皇權是否能夠深入到州縣以下，以及縣以下的行政管理是學者們廣泛關心的問題。在這一關懷下，對於明清江南市鎮管理機制的探討成果較豐，²此外，在對江南州縣行政與地方社會的研究中，州縣行政的具體內容以及制度在地方的實踐過程得到了揭示，讓我們看到王朝統治、州縣行政、地方利益是如何被緊密地裹挾在了一起。³近年來，胡恒針對縣以下行政區劃的研究表明，縣以下區劃的確立與調整是國家制度與社會自我發展的混合產物。此外，他梳理佐雜官員的設置及其負責的具體事務，更加全面地

2 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頁93-95；張研，〈清代市鎮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頁39-52；張海英，〈明清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學術月刊》2008年第7期，頁130-139。

3 馮賢亮，《明清江南的州縣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還原了地方官府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的具體辦法。縣以下行政區的設立與管理證明了國家權力在基層社會中的實質影響，由此駁斥了「皇權不下縣」以及有關縣以下不存在行政機構的說法。⁴而通過作者對清代基層社會組織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皇權可以通過鄉保制度滲透到鄉村社會之中，各種名目的人員為政府承應差役，定期到衙門點卯，使得地方官擁有了廣泛的信息渠道以了解鄉村社會的動態。

雖然皇帝的影響力及其授予的權力能夠由中央下達到地方，甚至深入到基層社會內部，但是地方與中央的權力競逐也從未停止，尤其在人事權、財權、軍權等問題上，中央與地方之間始終存在著張力。就人事權而言，劉錚雲通過探討「衝、繁、疲、難」新制的議定與改定，揭示出皇帝、吏部、督撫三方在州縣官員任用方式上的博弈。在制度上缺少商討空間的情況下，地方督撫改變策略，選擇就個別員缺人選違例上奏，繼續為自己爭取更大的人事建議權。

在財權方面，隨著「耗羨歸公」實施，「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了地方政府的財政事務，實際上，布政使及其他地方官僅是中央政府的徵稅代辦人，地方政府的預算和支出，包括薪水和辦公費，都由戶部來規定」。⁵而在清代所謂「原額主義財政」的基調下，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地方政府不得不擴大附加性或追加性課徵的範圍和數量，地方上的腐敗與陋規也難以根除。⁶在劉錚雲所討論的清代牙行應差案例中，州縣官府便是通過官給私帖來尋求可支配的自主財源，以應對中央政府對財權的全面掌控。近來，周琳基於《巴縣檔案》，對清代牙行制度予以深入探討，從而指出，官設牙行的主旨並非「便商」，而是充當地方官府徵調民間財貨的管道；在國家和地方財政漸趨好轉的時期，重慶官立牙行所承應的差務卻越來越繁重，造成這種情況的重

4 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5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14。

6 參見岩井茂樹著，付勇譯，《中國近代財政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70-101。

要原因在於重慶牙行易為官府所掌控，也容易成為其徵派的對象。⁷接著，周琳在〈徵釐與壟斷——《巴縣檔案》中的晚清重慶官立牙行〉一文提出，至咸豐至光緒時期，釐金取代差務成為牙行試圖包攬的稅收項目，憑藉與地方官府的新型合作關係，牙行努力攫取著地方市場的貿易壟斷權。⁸

在軍權方面，為應對太平天國動亂，清廷藉助士紳與督撫的力量於地方上興辦團練。孔飛力認為在「地方軍事化」進程中，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社會內部原有的平衡關係被打破，發生了一系列權力的重組。⁹張仲禮指出，隨著團練的興起，官府與士紳的關係日益緊張，「紳士們成為地方武裝組織的軍事首領，政府不得不坐視其勢力的劇增，並設法利用他們去鎮壓太平軍和當時其他的起義軍」；¹⁰同時，在士紳階層內部也出現了分歧與競爭，「上層紳士通常負責地方團練的組織與籌款，特別是較大區域範圍的團練；而下層紳士通常是在較小的區域內活動，擔任一些小地方的團練頭領」。¹¹以溫州金錢會事件為個案，劉錚雲深刻揭示出在籌辦團練與地方武裝的過程中，官紳之間、士紳之間發生的權力爭鬥，以及其對地方權力格局的重構。

與此同時，劉錚雲還提醒我們不能滿足於官紳對立或官紳合作的二元視角，而要注意「盜匪」群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對官、紳、盜三者的相互作用進行深入考察。近年來，同樣在對溫州金錢會事件的研究中，羅世傑則更加強調金錢會的宗教色彩，他認為金錢會所引發的集體行動，是地方齋教傳統與士紳之間因政治權力競爭而爆

7 周琳，〈「便商」抑或「害商」——從仲介貿易糾紛看乾隆至道光時期重慶的「官牙制」〉，《新史學》24：1（臺北，2013），頁59-106。

8 周琳，〈徵釐與壟斷——《巴縣檔案》中的晚清重慶官立牙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5（成都，2015），頁59-73。

9 孔飛力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地方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10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70。

11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頁70。

發的城際武裝衝突，因此，地方宗教組織作為長期被邊緣化的政治勢力，其在整個晚清政局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值得學者繼續關注。¹²

當傳統的社會秩序難以為繼之時，清代地方社會中湧現了大量的異姓盟會與宗教結社團體。裴宜理曾提出，要理解清代的會黨，不能僅僅將其看作是革命或起義的團體，而是要仔細研究這種現象發生發展所依賴的地方環境。¹³而在對清代秘密社會的研究中，學者們也強調，不能僅僅將宗教看成為反抗的理論外衣，¹⁴而更應該重視那些有著共同信仰的分散教徒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¹⁵通過對金錢會、哥老會等會黨組織的研究，劉錚雲指出，它們取代了家族與社群所能提供的社會網絡，給失去了血緣、地緣與業緣團體保護的社會邊緣人群以新的組織形式。同樣，白蓮教等宗教團體不但給予人以心靈的安慰，而且也提供了互助的組織制度和生活上的實際幫助。

會黨與社團的興起在各地掀起叛亂和起事的浪潮，最終在十八世紀末威脅到了清王朝的統治秩序。¹⁶而之所以到了清中後期，清廷統治日漸失效，社會秩序日益失範，恐怕還是要回到對「制度的運作」和「人的流動」這兩項議題上來討論。在中央與地方的制度博弈中，地方官府在人事、財政和軍事上的權力逐漸做大，然而其對州縣治下基層社會的治理卻並沒有相應的進步。無論是士紳操辦團練，還是民眾結成會黨，實際上都是在官府治理不利的情況下，由地方社會內部開始自行組織起自保、自治的有生力量，其與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嚴重威脅到了王朝統治的有效性，並最終導向了晚清的變局。

12 羅士傑，〈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2012，臺北），頁159-202。

13 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256。

14 歐大年著，劉心勇等譯，周育民、劉昶校，《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4。

15 韓書瑞著，陳仲丹譯，《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16 韓書瑞、羅友枝著，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132-136。

肆、結語

總體而言，《檔案中的歷史：清代政治與社會》將檔案材料與傳統史料相結合，在個案研究中發現大歷史，對清代的政治與社會面貌有著深刻的揭示。當然，該書也留下一些問題有待繼續深入探究。在論述清代基層社會組織時，作者認為地方上里甲、保甲與總甲的名目始終未能得到統一，是因為州縣官員只看重科派是否能夠得到滿足，而不在意制度的整齊劃一，但是這一推論依然未能解釋紛繁複雜的基層組織名目的來源何在。要解決這一問題，恐怕不能僅局限於清代的經驗，而應從明代乃至宋元時代的制度脈絡中尋找線索。近年來已有學者指出，在明代基層組織中，總甲與保甲之間存在著轉化和繼承的關係，但後者並沒有完全取代前者，而是出現了兩者融合、並存的現象，¹⁷這或許為清代保甲、總甲並立的現象提供了制度上的淵源。

此外，在對於清代牙行應差的探究中，作者指出州縣官府大量發給私帖，其目的是為了增加地方可支配的自主財源。近年來，隨著州縣檔案的開發日漸深入，我們可以看到牙行除了中介貿易之外，很多時候還承擔了替政府包攬稅收的職能。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義牙行制度和牙行群體，以及其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次，在對於清代會黨問題的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到了清中後期，大量人群會被排除在傳統的血緣、地緣與業緣的社會網絡之外，而溢出國家的基層控制網絡？檔案口供中自稱無業遊民的會黨成員在搶掠和起事之外，是否在地方上還從事著其他生計？他們與當地的社會網絡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相信通過對以上問題的持續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 and 認識清代的政治與社會變遷。

17 王裕明，〈明代總甲設置考述〉，《中國史研究》2006：01（北京，2006），頁145-160；薛理禹，〈明代治安管理中「總小甲」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4（上海，2015），頁131-137。

參考文獻

- 孔飛力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地方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王裕明，〈明代總甲設置考述〉，《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北京，2006），頁145-160。
- 岩井茂樹著，付勇譯，《中國近代財政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頁93-95。
- 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 張研，〈清代市鎮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頁39-52。
- 張海英，〈明清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學術月刊》2008年第7期，頁130-139。
- 馮筱才，〈「中山蟲」：國民黨黨治初期瑞安鄉紳張桐的政治觀感〉，《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4期，頁156-169。
- 馮賢亮，《明清江南的州縣行政與地方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歐大年著，劉心勇等譯，周育民、劉昶校，《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薛理禹，〈明代治安管理中「總小甲」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上海，2015），頁131-137。

韓書瑞著，陳仲丹譯，《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韓書瑞、羅友枝著，陳仲丹譯，《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瞿同祖著，范忠信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On Liu Cheng-yun's *History in Archive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MA Chaoran*

History in Archive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written by Prof. Liu Cheng-yun, presents the author's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collecting archives and studying Qing histor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is book discusse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attempts to combin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newly emerging archival records, in order to provide a much broader picture of Qing history. By means of several case studies, the book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rom which to examine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 of the Qing Dynasty.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always a tension am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society. In the progress of decision 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elite politics and ordinary life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In addition, from the mid-Qing Dynasty, due to social upheavals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moral disorder, the 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as gradually intensified, resulting in a new round of power restructuring.

Keywords: Liu Cheng-yun, Qing archives, institutional operations, local society

* M.Phil,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